

前车之鉴 触目惊心

【俄】谢·格拉济耶夫 著
佟宪国 刘淑春 译

俄罗斯 改革的 悲剧与出路

——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

- 叶利钦政府首任外经贸部长回顾改革
- 俄罗斯“民主派”的深刻反思
- 前苏联党政官僚蜕变为新资产阶级
- 国际资本与寡头买办勾结掠夺财富
- 私有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
- 重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IC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俄】谢·格拉济耶夫 著
佟宪国 刘淑春 译

俄罗斯 改革的 悲剧与出路

——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IC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张 艳

技术编辑：杨 玲

责任校对：平 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 / (俄) 格拉济耶夫著; 佟宪国, 刘淑春译.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ISBN 7-80162-678-8

I. 俄... II. ①格...②佟...③刘... III.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219 号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
——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

[俄] 谢·格拉济耶夫 著
佟宪国 刘淑春 译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80mm×1230mm/32

10.75 印张

232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162-678-8/F·600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通讯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邮编：100836

联系电话：(010) 68022974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1881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Economic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Genocide (October 1993— August 1998) Copyright ©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xecutive Intelligence Review and Sergei Glazyev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我第一次看到本书的英文版时，立刻被引人注目的标题所吸引。本书论述的是俄罗斯走过的曲折改革历程，这无疑是众多中国人特别是经济工作者关心的话题。尽管我不赞成俄罗斯改革的“休克疗法”，却仍对本书既感兴趣又抱有怀疑，疑心作者是否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我的疑虑很快打消了，而且还深深被作者的特殊经历所吸引。

本书的作者谢·格拉济耶夫，不仅是俄罗斯的著名经济学家，还是一位自由民主派人士。格拉济耶夫毕业于国立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早在前苏联时期，他就敏锐察觉到计划经济的弊病，批评前苏联时期的特权腐败现象，还积极主张进行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由于格拉济耶夫是有很高造诣的经济学家，并很早就投身于俄罗斯的改革运动，1991年叶利钦上台执政后，他被任命为首任对外经济关系部部长。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外经贸部门是令人羡慕的肥缺，俄罗斯的新兴大富翁和金融寡头，有不少是从外经贸部门和金融银行系统起家的。

令人钦佩的是，尽管格拉济耶夫身居外经贸部门的要职，却并未像许多俄罗斯新兴官僚那样，趁市场经济转轨的混乱机会，投机钻营大发横财，他仍然保持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良知。当他

看到俄罗斯遵循美国推荐的“休克疗法”，造成了物价飞涨、生产衰退和民众贫困，就果断地为俄罗斯民众的痛苦大声呼吁，对叶利钦的这种激进改革做法提出了批评。格拉济耶夫特别感到愤怒的是，前苏联时期的党、政官僚和经理阶层，以前还主要搞职务特权享受的腐败，摇身一变投靠了叶利钦政府之后，私欲膨胀、贪污腐败千百倍扩大，变成趁私有化之机疯狂掠夺、大饱私囊，巧借种种花招将巨额资产直接化公为私。格拉济耶夫认为，即使物价猛涨是“短期阵痛”，但私有化运动中贪污腐败泛滥，则必将改变俄罗斯改革的方向，倘若不制止，它必将变成难以治愈的毒瘤。格拉济耶夫希望通过议会民主的方法，制定法律阻止私有化的腐败泛滥，限制新兴官僚损害民众的激进改革。

1993年，由于叶利钦激进改革措施造成的恶果，俄罗斯改革阵营出现了第一次大分化。当时的议会还称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大部分议员都曾是叶利钦的坚决拥护者，戈尔巴乔夫时期为了推动改革步伐，他们曾大胆违反前苏共中央的意志，将叶利钦选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到了1993年，看到叶利钦激进的“休克疗法”的恶果，特别是私有化造成的腐败掠夺泛滥，大多数议员像格拉济耶夫一样，主张应限制叶利钦作为总统的权力，制定一些限制腐败和缓解社会矛盾的法律。但是，私有化已释放了巨大腐败掠夺贪欲，要想阻止新兴官僚权贵的财路，断送他们唾手可得亿万财富的机会，无疑是民主理想主义者的“虎口夺食”。令格拉济耶夫和其他议员失望的是，他们很快被俄政府和新资产阶级控制的媒体，痛斥为阻碍市场经济改革的保守势力，当总统同议会的矛盾尖锐化之后，叶利钦不惜抛弃曾将自己选上

台的恩人，上演了调动军队炮轰议会大厦的悲剧，以违反民主的暴力手段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巩固了总统手中的权力和新兴权贵利益。当隆隆炮声和血洗议会大厦的事实，令格拉济耶夫的民主理想破灭之后，他愤然辞去了叶利钦政府的外经部长职务，果断投身到了批评政府的反对派阵营。

其实，俄罗斯信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都像格拉济耶夫一样，从以前坚决拥护叶利钦的改革，到对俄罗斯改革的现实大失所望，进而转向了强烈地批评叶利钦。俄罗斯著名作家维亚·康德拉季耶夫，曾是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拥护者，对叶利钦的改革充满着期待和希望，但是当大规模私有化的恶果逐渐暴露时，康德拉季耶夫痛心地奋笔疾书，称再也不能为这种市场改革唱赞歌，这种“改革”造就了数以万计的暴发户，却使社会上领养老金者日益贫困。1993年9月叶利钦炮轰议会之后，康德拉季耶夫开枪自杀，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俄罗斯著名作家亚·季诺维耶夫，前苏联时期因持不同政见流亡海外，他目睹激进改革造成的巨大社会灾难，称“我写了三十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这样的结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由于这些俄罗斯的著名作家不懂经济，他们只是对社会灾难感到困惑和悲观，却难以深刻反思俄罗斯改革失败的原因。格拉济耶夫作为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还担任了叶利钦政府的外经部长，他对于俄罗斯曲折改革历程的深刻反思，能够为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工作者，提供更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

格拉济耶夫的这本著作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

1993年叶利钦炮轰议会，独揽大权削弱议会的制约作用之后，毫无顾忌推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格拉济耶夫引证了大量资料和统计数据，详细阐述了改革对俄罗斯社会的全面影响，包括人口状况、社会福利、卫生医疗等等。书中的资料数据既翔实丰富又触目惊心，如私有化过程中企业亏损面的急剧扩大，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的大幅度衰退，国家财力衰败和社会保障、卫生系统瘫痪，随着而来的各种恶性传染病的死灰复燃，俄罗斯人均寿命的大幅度降低，持续的人口死亡率超过出生率的趋势，与贩毒、吸毒相关的犯罪率爆炸性增长，还有劳动就业、社会分配等方面的详细指标。格拉济耶夫随后分析了改革存在哪些政策失误，通过怎样的经济机制导致了一系列社会恶果，如1992年的价格自由化的改革，如何导致了居民收入和储蓄的剧减；新兴的官僚权贵趁私有化改革大肆掠夺财产，如何导致大多数居民丧失了享有公有财产的机会；纵容股票证券市场的投机金字塔，如何导致普通股民蒙受了巨大的财产损失；政府采取的错误宏观经济政策，如何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并导致居民收入锐减；金融寡头和新兴权贵阶层如何操纵政府，通过财政金融政策掠夺国库和居民储蓄等等。

格拉济耶夫著作的第二部分，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所处的地位和前景。格拉济耶夫认为，俄罗斯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既有经济贸易联系加速发展的趋势，又有国际大资本操纵全球化过程，促使发展中国家陷入边缘化的危险。格拉济耶夫分析了美国如何通过影响俄罗斯改革，力图培育俄罗斯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性，利用私有

化形成新兴买办权贵阶级，诱迫俄罗斯放弃贸易、财政金融等经济主权，逐步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战略行业，通过高利率的债务陷阱掠夺资源，促使俄罗斯沦为出口原材料的殖民地经济。

格拉济耶夫著作的第三部分，提出了重新振兴俄罗斯的详细经济纲领，他认为在当前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由于俄罗斯拥有雄厚的科技人力资源，还有前苏联时代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只要抛弃了叶利钦时代的错误改革政策，就有充分信心实现俄罗斯经济的重新崛起。格拉济耶夫还详细论述了政府应如何制定经济政策，进行宏观经济调节和产业结构调整，利用财政金融杠杆刺激投资，克服经济危机并促进可持续的增长。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前苏联那样，从强盛的帝国骤然土崩瓦解、衰败不堪。对于外国人来说，超级大国前苏联的迅速衰败令人惊讶。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前苏联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中国，一旦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经济发展潜力很可能也超过中国。但事实上，俄罗斯改革后并未产生经济奇迹，倒是经济衰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从改革前国民收入为中国的两倍多，下降到今天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这种矛盾现象令人难以解释。格拉济耶夫作为民主自由派经济学家，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和深刻的剖析，为揭开这个谜底提供了某种答案，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格拉济耶夫的著作值得中国人一读，还因为俄罗斯的改革成败兴衰，直接关系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001年3月，外电报道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战略报告，其中认为世界实力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随着俄罗斯力量的削弱和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将

对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将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布什总统还公开声称，俄罗斯经济衰落难以维护现有核武库，无法作为北极熊重新苏醒过来了。俄罗斯的例子给人们的警示是，改革成败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益，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格拉济耶夫指出，美国诱迫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其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恶果的严重程度，完全符合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罪行”的定义，可以说是针对俄罗斯的一场“地缘大屠杀”。中国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种族灭绝”一词，但俄罗斯学者却常用它来形容实行“休克疗法”之后，人均寿命下降、人口数量减少的社会灾难。我撰写的《软战争》一书中，曾将美国推荐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药方，比喻为隐蔽经济战争的厉害暗器，还剖析了这些暗器的破坏原理和作用机制。格拉济耶夫著作的详尽论述，从不同侧面证实了我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普京上台执政以来，俄罗斯经历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后，终于出现了明显的恢复势头，2001年俄罗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5%，工业产值增长5%，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有些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好转，说明其已走出衰退低谷雨过天晴，“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虽然代价不小，但最终还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现在没必要总结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但是，真正熟悉本国情况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却有着更为冷静、客观的看法。《俄罗斯企业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其中有寓意深远的形象比喻，“这个国家可恰当地比喻为一个病人，刚刚从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来，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

刚刚摆脱了剧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康复……”

目前，俄罗斯经济仍面临着许多困难，据报道，尽管2001年俄罗斯的投资增长9%，但仍然远远无法弥补折旧的损失，仅为基础设施和设备损耗的三分之一，谈不上扭转经济基础的衰败趋势，只能说缓解了以前的衰败速度。普京打击寡头阻止了一部分非法掠夺，但仍未能根本改变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富人获得了大部分经济增长好处，社会贫困率仍然保持很高水平，广大普通人的获益非常有限。俄罗斯人口下降的趋势仍未能扭转，特别是社会卫生医疗状况仍未改善，自1997年以来艾滋病毒的感染人数，每年均以成倍的速度迅猛增长，据英国皇家学院的专家的测算，五年后总人口感染率可能将达到5%，属于艾滋病传播最快的国家之一。随着基础设施服役期和外债偿还期的到来，俄罗斯经济形势仍有可能由晴转阴，社会矛盾也随时可能再次尖锐化，俄罗斯政治走向仍然充满变数。

俄罗斯经济长期萧条后趋于好转，绝非私有化带来十年的痛苦之后，又重新变成了“灵丹妙药”，与此相反，这恰恰同普京敢于调整叶利钦的政策失误，执政后发动了打击金融寡头的强大攻势，迫使两个最大的金融寡头流亡海外，同时搁置了丘拜斯的一系列私有化计划，特别是涉及重要战略行业的私有化，采取果断措施惩治经济犯罪和腐败，阻止金融寡头勾结腐败官员掠夺社会财富，将巨额掠夺资金非法转移到海外有关。普京执政后对经济政策的调整，同格拉济耶夫等反对派经济学家的努力，不断抨击寡头勾结腐败官员掠夺有很大关系。

格拉济耶夫辞去叶利钦政府的部长职位后，1994年担任了俄罗斯民主党的领导人，后来被选举为国家杜马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他反对“左翼”或“右翼”的政治划分，主张一切俄罗斯爱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振兴俄罗斯经济而努力。由于格拉济耶夫清正廉洁，当主流经济学家纷纷卷入腐败丑闻，或因主张政策陷入失败声誉扫地时，格拉济耶夫在俄罗斯的声望正日益提高，俄罗斯报刊称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格拉济耶夫撰写的这本著作，已在俄罗斯多次出版，社会影响很大，还被翻译成了英文流传到西方国家。

我阅读了格拉济耶夫的这本著作后，深感很有必要向中国读者推荐，就拜托友人征求格拉济耶夫的意见，是否同意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格拉济耶夫欣然表示同意，在此特向他表示衷心感谢。本书的翻译出版，还应感谢佟宪国先生、刘淑春女士以及经济管理出版社的杨世伟先生、张艳女士，他们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完成了本书的翻译、编校工作，促使本书能尽快同广大读者见面。当然，对本书中一些观点和有关评价，读者必是会见仁见智。我为本书作序，引荐大家，也决不意味着对书中所有观点和评价全部赞同。

杨 斌

2003年1月于北京

英文版序言

俄罗斯灾难性的自由主义“改革”的 背后：一种致命的政策形成模式

林登·拉鲁切

俄罗斯或许能够逃过撒切尔主义这一劫。

在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博士这本书的英文版付梓之时，我们已经看到两个曾在后罗斯福时代主宰世界的主要超级大国联盟现在都陷入接二连三的经济崩溃之中。目前，我们还不能科学地预测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主宰的世界金融体系会在哪个星期坍塌，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体系注定要灭亡，而且为期不远。

关于不远的将来整个世界的经济情况，我们所能肯定的仅有下面两点事实。第一，如同今天的许多首席银行家及其他人一样，我们可以肯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系将不可救药地走向破产，它目前正处在一个或一连串的崩溃边缘，这些崩溃将具有突发、系统、致命以及引发连锁反应等特点。我们只是还不清楚这种总崩溃爆发的确切日期以及在诸多可能引发全面崩溃的因素中

究竟哪一个会成为导火索。第二，我们知道，要么由世界一些主要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对当今的世界金融体系实行破产重组，要么干脆任其自行解体。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其结局将是出现事实上的全球经济混乱。以后一种方式出现的崩溃，将会把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甚至整个世界拖入一个“新黑暗时代”，犹如14世纪中叶时的欧洲那样，这一时代或许会长达几十年。

以1989—1991年经互会和苏联的解体为例，有人认为在促成崩溃发生的诸多因素中许多都带有自愿的性质，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其中哪些属于因苏联领导人采取行动和不采取行动的错误抉择所致，目前尚有争议，但在抉择中出现过某些重大失误却是不争的事实。无论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哪些是出于自愿，但至少还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这个制度的垮台归根结底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孤零零的几项个别决策错误。决策体系本身已经四处弥漫着系统性的弊端，错误的决策不过是这些系统性弊端所产生的结果罢了。

关于目前正摇摇欲坠的世界金融体系，即所谓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我们也须采用同样的判别方法。当代的世界金融体系眼下正走向解体，究其原因除了所有那些次要问题，简单地讲就是因为当今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也具有我的“三边曲线”所描绘的那些决策特征，任何表现出这些特殊职能特征的体制都一定会因之而解体。

所以，我们必须指出，目前正在发生的崩溃，乃是由于系统性的、而非偶然的原因所致。

譬如，情况已经表明，给当今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种下“浮动

汇率货币制度”这一内在祸根的，乃是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所采取的一些荒唐行动。这样看来，尼克松的任何一位继任者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领袖，从理论上讲，都可以将尼克松、乔治·舒尔茨等前辈在1971—1972年间的失策矫正过来。而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后来做出的决定简直比尼克松的失策更加坏事得多。当人们考虑到强大的利益集团通常可以左右政府的当选和下台这一因素时，他们或许就会发现这样一种基本情况：那些官员除了就货币政策、金融政策以及经济政策的长期趋势做些愚蠢的决定，什么事情也不能做。

大西洋两岸的列强们之所以并不想去纠正1971—1976年在货币政策方面出现的可怕错误，其原因需要到被人正确地称之为由伦敦牵头的“大西洋组织”内部去寻找，即要到在该组织中起主导作用的那些派别进行决策的系统性特征中去寻找。将当今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由1971年8月的荒唐行动引至今日致命的“金融衍生物泡沫”危机，这并非哪一项政策的缘故。导致当今世界金融体系匆匆走向灭亡的背后原因，并不是哪一项个别决策的错误，而是实现政策花样翻新的最终模式中存在的致命问题。情况已经表明，一般地讲，最致命的荒唐行动就是在英国首相撒切尔长期统治的影响下大西洋两岸列强所采取的那些政策。

这个观点还须反复地讲，即问题并不在于哪一项具体决定本身，而在于当今的“大西洋组织”所具有的社会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这也正如苏联体制的垮台乃是源于这种组织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特征一样。问题就出在已经约定俗成并打上了意识形态烙印的决策变更模式之中，这种决策变更定制就像设定“行星”轨

道一样已经将由此产生的纯粹后果预定好了。因此我们说，决定事物灭亡的道路犹如一颗行星的运行轨道，从本质上讲结果已经被系统规定好了，而非有人在其运行的过程中进行了几次孤零零的方向调整所能改变的。

因此，无论是已经垮掉的苏联体制还是目前注定要走向灭亡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两者的命运都是早已注定了的，注定这种体系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的因素，就潜伏于该体系的行为特征之中，就像物种的行为特征决定了它们的死亡一样。

从生理上讲，被汽车碾死的兔子是有能力躲避这一风险的，但兔子的本性特征使它在做出新选择时注定要成为等候在一旁的乌鸦们的口中佳肴。本领高超的猎手就是凭借自己对所要捕获猎物的了解，根据这些猎物固有的行为习性和肯定会犯的错误进行捕猎，这也正如高超的军事家常常会智胜那些筹划不如己的待擒猎物一样。动物也有学习的本领，但它们不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偏好去作推断假设并借此提高自己。所以，一切低等物种都注定要灭亡，这样的命运乃是体系的问题，而非此种动物的孤立决策所产生的偶然结果。

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灭亡，并不在于导致它们灭亡的那些决定因素中某一个或若干个。人类，当然也包括社会，有能力改变一定社会的民众行为特征。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垮台，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决策方式中存在着推断习惯上的缺陷，而制度本身却又顽固地抱残守缺，拒不变革。苏联的体制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71—1999年期间的决策模式也是如此。

因此，在对一度强大的政治体制为什么会自取灭亡的问题进

行考察时，我们必须既要注意低等动物与人类的共同点，也要注意两者间质的差异。两者间的差异就在于，人类实际上总是可以做出理性的选择。所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社会利用推理的办法求得生存的潜力、即认知并纠正那些看似由社会内在的推理假设所造成错误的潜力有多大。

两个目前已经注定灭亡的体制在决策模式中都存在致命的缺陷，关于这些缺陷的性质我们可以数学家在解题时选用何种具体定义、公理和基本条件的情形作类比。如果这位数学家仅仅选用与自己的（常常是不明智的）推理假定相吻合的定理来解题（例如就实际问题作决策），那他就一定会失败。因为与定理一样，如果这位数学家是根据错误的定义、公理和基本条件形成了自己的意见，那么他所推导出的每一个关键定理都将是错误的。这样的错误就属于系统性错误，其性质既不是偶然的，也非过渡性的。

如果一个社会采取了这样的错误决策方法，则该社会最终会因顽固地坚持那种“为人普遍接受的思想”而注定灭亡，这才是我们必须认识的引起系统性崩溃的真正原因。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区分哪些是由于决策时偶尔发生的一系列失误而造成的暂时性垮台，哪些是系统性垮台。系统性经济危机（譬如当前的世界性危机）与一个尚在顺利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临时性、周期性危机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所以，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博士和我，也像其他人一样，不能不去研究那些显然很快导致苏联体制及其由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后来的模式——俄罗斯体制走向灭亡的系统性原因，而不仅仅是研究那些偶然性原因。在我看来，他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